

# 玉魂国魄

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七)

(中华玉文化特刊)

杨晶 陶豫 执行主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

# 玉魂国魄

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七）

（中华玉文化特刊）

杨 晶 陶 豫 执行主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七)(中华玉文化特刊)/杨晶,陶豫主编.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540-0959-8

I. ①玉… II. ①杨… ②陶… III. ①古玉器-中国-文集 IV. ①K876.8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4024号

## 玉魂国魄

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七)  
(中华玉文化特刊)

-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 责任编辑 关俊红
- 责任校对 吴颖胤
- 美术设计 刘欣
- 责任印务 楼浩凯
- 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 889×1194 1/16
- 印张 29.5
- 字数 760千
-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
- 印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 书号 ISBN 978-7-5540-0959-8
- 定价 298.00元
- 网址 [www.zjguji.com](http://www.zjguji.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中华玉器文化第五届中国传统文化中心暨第七届中国古代玉器文化学术研讨会合影

《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七）》

（中华玉文化特刊）

编辑委员会

主任：张忠培

副主任：徐文光 柳河 朱华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东峰 王妹 方勤 刘斌

杨晶 吴立炜 陈寿田 金国平

周黎明 郭青岭 陶豫 蒋卫东

执行主编：杨晶 陶豫

编务：夏勇 周佩佩 孔梦悦 黄莉

# 目 录

- 在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五届年会上的讲话 ..... 张忠培 (1)
- 九连墩玉器初探 ..... 胡雅丽 翁 蓓 (9)
- 九连墩楚墓出土玉器初步解读 ..... 张绪球 (23)
- 九连墩战国楚墓出土的玉雕羽人：图像识读与形式溯源 ..... 黄翠梅 (37)
- 解析楚国人形和人首纹玉器 ..... 蔡路武 翁 蓓 (46)
- “透雕兽面形玉佩”图像试释 ..... 院文清 (56)
- 湖南战国墓出土的两组玉器研究 ..... 喻燕姣 (65)
- 谈谈当今学界东周玉器研究的盲点 ..... 邓淑苹 (76)
- 东周主题型玉器研究 ..... 殷志强 (89)
- 东周组玉佩形纹设计研究 ..... 吴棠海 (97)
- 东周时期虎形玉器初探 ..... 杨 晶 祝 萌 (113)
- 试论东周时期楚地组玉佩饰的形制及使用特点 ..... 杨小博 (134)
- 东周时期越国用玉制度突变考 ..... 黄昊德 (152)
- 论鸿山越墓DVIIM1年代、玉器文化内涵及其他 ..... 杨建芳 (164)
- 耕战传统下的别样奢华
- 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玉器的初步研究 ..... 蒋卫东 (175)
- 浙江先秦墓葬出土玉器浅析 ..... 田正标 (202)
- 侯马晋国祭祀遗址出土玉器研究 ..... 马金花 (216)
- 对凤玉瓶饰
- 战国中晚期玉雕之希腊化艺术风格 ..... 林继来 (236)
- 古玉器表次生变化分析研究
- 以荆州楚王陵园出土玉器为例 ..... 陈启贤 (251)
- 古玉中的水银沁现象探析
- 以南阳桐柏月河一号墓出土春秋玉器为例 ..... 徐 琳 王金霞 (261)
- 良渚玉文明 ..... 方向明 (270)
- 浅谈良渚文化时期鸟的功能与意义 ..... 费国平 (279)



良渚文明与古埃及文明的比较研究 .....	陈明辉 刘 斌 王宁远	(282)
斧钺分化与（斧）钺璧组合 .....	郭大顺	(305)
璜与圆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玉器组佩 .....	赵 晔	(320)
礼仪从头开始——说玉玦 .....	夏 勇 王明达	(335)
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玉玦研究 .....	黄建秋	(345)
齐家文化与龙山文化考古出土玉器的对比研究 .....	王裕昌	(359)
齐家文化玉琮研究 .....	朱乃诚	(371)
郭家庙墓地1号墓出土玉器的初步整理 .....	陈 春 方 勤 胡 刚	(392)
一件银框镶百戏纹玉卮之考察 .....	刘云辉 刘思哲	(399)
汉代的玉面罩和镶玉漆面罩 .....	李银德	(405)
中华玉文化中心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	孔梦悦	(417)
东周玉器出土资料目录（2000至2015年） .....	祝 萌 赵 萌	(425)
后 记 .....	杨 晶 陶 豫	(463)

# 在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五届年会上的讲话

张忠培

## 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参加今天会议的朋友，已经参观过了中华玉文化中心为这次年会举办的展览，和都知道这次年会讨论的主题，从这两个方面的内涵来看，我相信大家已经感到中华玉文化中心的学术追求，同以往历届学术活动的内涵相比，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刻。我们怎么走进这个新的时刻？这是我首先应向大家，尤其是需向中华玉文化中心理事会报告的一件事。

早在两年前的中华玉文化中心第四届年会期间，我邀请了一些理事开了一个小会，就中华玉文化中心今后学术活动的方向征求意见。会议进行得较为热烈，我听了之后，一是感到意见纷呈，二是认为任何一种意见，是否有可行性，是否可以操作，这两方面我均没有把握，所以我没有做出结论。请大家会后再想想，有什么新的意见，望向我说说。第四届年会闭幕之后，我立即开始摸查玉器的发现与研究的情况。杨晶告诉我，湖北这些年玉器的发现与研究做得还不错。我觉得她这个意见有些道理，便找了湖北省文物局局长黎朝斌，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副馆长孟华平商量，请他们支持，和中华玉文化中心合作，今后六年在良渚博物院推出战国、春秋和西周时期三次展览，并举办与此相关的学术研讨会。我的这一建议，他们满口答应。之后，我将这事通报了吴立炜，他也满口应承，并依我的建议和湖北省相关部门签订了协议。这就是办成这事的经过。

令人惊喜的是，在这次会上，方勤馆长又报告了他们在史前时代的石家河遗址的新发现。这个新发现，刷新了长江中游史前时代玉器的面貌。他的报告震惊了会议。中华玉文化中心对于这一发现，该不该有所作为？如何作为？何时开展这类事项？这些问题都得听取同仁们的意见，才能做出决定。

中华玉文化中心在此以前举办的展览和开展的玉器·玉文化学术研讨会，均限于史前时代，从现在开始至今后四五年内，我们的这些活动，转入到了西周和东周这两个历史时期。

西周晚期输入的制铁技术，至东周得到了发展，社会出现了新产业。至此，中国走出了青铜时代，跨入了铁器时代。制铁业挤入传统手工业的结果，一是增加了手工业门类；二是使原来附属于农业的一部分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三是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手工业被新材料、新技术装备了起来，便得到了纵横发展，同时，将铁工具用于农业，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产生了五口之家经营百亩之地的小农经济。不同手工业之间，以及手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交换，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发展的商业，促使各国纷纷铸造用作交换媒介的金属货币的同时，形成了包括巨商大贾在内的具有显赫势力的商人阶层。伴随着经济领域中出现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和交换方式的变化，社会便出现了社会结构、社会成员构成和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变易。东周各国为适应这经济和社会的变易，纷纷变法改革，其结果便是东周巨变。

中国自农业革命之后的长达万余年的历史中，经历了如下几个大的变革：



一是早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之际，在中华大地上实现了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产生出了神权与军权并重的神王之国的国家形态。

二是在公元前两千多年之时，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发展出军权凌驾于神权之上的能容纳单一考古学文化族群的比较成熟的王国政权（夏王朝）形态。

三是商王朝晚期，青铜时代进入了鼎盛时期。约在这个时期的后期，周人学习商人的先进文化，掌握了商人的文字和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推翻了商王朝，建立了周王朝。周王朝的政权形态虽同夏商王朝一样，也是王朝王国，但和夏商王朝存在着重大区别，其推行封建政治体制，实行“齐政修教”、“因俗而治”，改变了夏商王朝只容纳单一考古学文化族群的政权体制，实现了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族群纳入周王朝的管理与统治，开启了多民族国家的先河，从此使中国国家步入了多民族国家管理与统治体制的轨道。

四是上面说的东周巨变。这一巨变变革了周王朝建立的封建政治体制，至秦确立为皇朝帝国政治体制。“百代皆行秦政制”，至辛亥革命，秦皇朝创立的帝国政治体制历经兴革修补，延续了两千多年。

五就是辛亥革命。自此，皇朝帝国政治体制退出政治舞台，走上了党治国家道路，简称为党国的政治体制。

这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形态，或政治体制走过的和正在走的历程。

东周巨变不仅具有政治体制变革的意义，也表现在文化方面。这文化方面的表现，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士”的阶层的形成。所说的“士”的阶层，拿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智识或被称之为知识分子阶层。

二是在先前的中国文化与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因应时代的变易涌现出来的对未来时代的追求，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著书立说，齐放、争鸣，使中国的文化与精神文明实现了巨大质变，形成了以孔子和老子思想为核心的华夏文化与精神文明，从此中国文化与精神文明升华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时代，可以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话，称之为“轴心时代”。中国文化所以延绵不断，就是因为有这样轴心时代呈现出来的具有轴心意义的思想与文化。从整个中国思想史来看，无论是孔子和老子的思想，还是诸子百家的学说，相互之间虽有吸收与借用，但都是原创于中国，或中国的原创。从中国这一意义观察，借用梁启超的话来说，直至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可称之为中国之中国，佛教和明朝晚期西方文化传入之后的中国，当分别名之为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的时代，国人因应时代的变化，发展出或创立了许多重要思想，推进了中国的发展，但构成这些思想的元素，乃至其中重要的元素，甚至形成这些思想的始原，均非中国本土所出，无不同入境的外来思想相关。

三是与上述“一”“二”密切相关，东周时期通过非华夏文化谱系的族群（有的已立“国”，如越、楚）和同属华夏文化谱系的族群的不同地域集群（有的已立“国”，如三晋）之间的文化竞逐、碰撞和交流，文化与族群自识日益趋同，最终融合为华夏文化所标示的华夏族。东周各国基于华夏族的自识与认同，故建立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统一政权，便成为了它们相互征战的追求。

东周的华夏族，至秦，被称为秦人，至汉，被称为汉人，至唐，被称为唐人，近代的他称和自称，均为汉族。华夏族虽经历朝历代的自身发展，尤其是如同黄河在其不同的流段中融入不同支流那样，也在不同时段中融合了其他族群，出现了变化，演变成为汉族，但不能

变化的则是华夏族乃是汉族的始源这一历史形成的事实，同时，虽经历朝历代的变异，华夏族是秦人、汉人、唐人和汉族族源中的主源这一事实，也未能变化，可见，华夏文化具有巨大的生命力。正因为春秋形成的华夏族及其文化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才使中国成为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不是政权意义的“国家”，是指领土和人民这一意义的国家）、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和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形态一直存在下来。历史的积淀如此深厚，以至成为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从以上讲的来看，可知东周时代，在产业革命上，是开启了中国铁器时代的时代；在政治体制上，是将王朝王国革新为皇朝帝国的变革的时代；在思想与文化上，是思想家著书立说创立中国思想与文化根基的时代；在族群上，是汉族的始源和主源的华夏族的形成的时代。在中国长达五千年的文明长河中，东周时代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的社会变革的关键地位。

东周玉器，在这巨变的社会中，表述了什么样的文化？这文化在东周的文化总体中，肩负了何种功能，起了什么样的社会作用，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东周玉器与玉文化，在这巨变的社会中，是否出现过变化，出现过什么样的变化？东周玉器与玉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在什么样的根基上成长起来的，又长出了什么样的枝叶，呈现出什么样的源与流，为何有这样的流变？我的这些问题，是我之所以策划九连墩墓地出土玉器展，和再过两年将举办熊家冢墓地出土玉器展，以及举办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动因，这也是向在座的和未能出席这次学术研讨会的研究玉器与玉文化的朋友求教的问题。我将认真听取在座专家的意见，期望整个东周玉器及其表述的文化的研究，通过自由讨论、齐放争鸣，从这里升华。

## 在闭幕式上的讲话

在开幕式上，我说过中华玉文化中心今次学术研讨会处在一个转折点上，转折得怎么样，我看这个转折的起步，是相当不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会有十三篇文章是讨论东周玉器与玉文化的，另外还有两三篇文章涉及了东周，我认为内容相当丰富，提出的见解均有新意，能发人思考。总之，现在可以说，我们谋求的中华玉文化中心学术活动内涵的转折，已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下面，我和朋友们讨论这样两个问题：

### （一）需将中国玉器与玉文化研究放在中国文化变革之路中进行考察

研究中国玉器与玉文化，应当将玉器与玉文化放在中国文化整体中进行考察。

中国整体文化经历了历史的变迁，故为了将中国玉器与玉文化置于中国文化整体中考察，就需对中国整体文化的变迁有所了解。至少，是大体的把握。同时，要了解甚至大体把握中国整体文化，谈何容易，这是一门很难做到的学问。怎么办呢？我想能认识中国思想、哲学的变迁，便可能把握中国整体文化的脉动。因此，我建议研究玉器与玉文化的朋友，能读一些思想或哲学史方面的著作。

我在本届年会开幕式上说过，东周是“创立中国思想与文化根基的时代”，“形成了以孔子和老子思想为核心的华夏文化与精神文明，从此中国文化与精神文明升华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时代，可以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话，称之为‘轴心时代’”。东周之所以能被称之为“轴心时代”，是因为这个时代树立了孔子和老子这两根文化与思想的大柱。之所以将东周称之为“轴心时代”，还因为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并没有停止在这个时代，在



不断地走出这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的同时，涌现出来的或新的形态，或既是新形态又是新质的思想与文化，都同这一时代的思想与文化存在着某种关联。

两汉之际，佛教进入中国。因应佛教之传入中国，便依据老子的某些思想，尊老子为祖师，中国创立了道教。佛教进入中国初始，先是在社会下层民间传播，至南北朝时期，挤进中国社会上层，到了唐代，为适应中国水土，吸纳儒、道两家的思想与文化的养分，发展成禅宗。至此，佛教便成为中国的佛教了，成为了支撑中国文化与思想大厦的第三根柱子。但中国的儒、释、道的思想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吸纳没有就此结束。儒家因应佛教发展为禅宗，一是因袭自身传统，二是吸纳释、道两家，尤其是禅宗的思想与文化的一些营养，三是予以融合与创新，到了宋代，便发展为宋明理学。至此，儒、释、道便成了中国思想与文化的传统。

历史发展到明代晚期，由于欧洲耶稣会以澳门为基地，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先是在民间，后闯入社会上层，直至成为皇室的宾客，一是向中国输入了西方科学、技术、思想与文化，二是也将中国的科学、技术、思想与文化传到了欧洲，这就开启了以儒、释、道为一方和以西方思想与文化为另一方的碰撞的历程。这历程崎岖、险峻，碰撞发展到兵戎相见，中国人累累败阵，乃至赔款割地，得出的结论是，还得向西方学习，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及“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得出要搞“共和”的结论。至此，儒、释、道式微，处于“用”的位置了，“共和”成为了支撑中国文化与思想大厦的第四根柱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实现了走进“共和”的条件，但终究未走到“共和”，搞了个党国体制。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推翻了国民党建立的党国体制，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或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至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了支撑中国文化与思想大厦的第五根柱子。时序虽处第五，但在国家和社会的位置，却和儒家在皇朝帝国国家和社会中那样，成为了国家的社会思想与文化的主流，成为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指导思想，成为了国家思想的理论基础。然而“共和”或它的变种“普世价值”，却不甘心退出舞台，不时地在我们的社会中涌动，挑战着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理论与思想基础。

这就是中国自春秋时代以来已经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思想与文化之路。

我之所以在这里讲了自己认识的中国自春秋时代以来所走过的和今后还要走的思想与文化的路，如我开头所说的那样，是希望朋友们将玉器与玉文化之研究，纳入中国思想与文化研究这一整体学术环境中来，是不是应该这样？请朋友们考虑。

## （二）如何用考古学方法研究玉器与玉文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考古学对含玉器的遗存的大量发现，从中获得的玉器与玉文化信息的数量与质量，已远远超越了人们从传世玉器得到的玉器与文化的信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不仅是因为考古学发现玉器数量之多，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学者坚持了以考古学方法考察考古学发现的玉器。这是之所以能从其研究的玉器中获得的信息，比从以传统的方法研究传世玉器得到的信息的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原因。因此，我们应该继续推进以考古学方法研究考古发现的玉器与玉文化，而且还主张以考古学方法和考古发现的玉器的研究成果，去审视、释读传世玉器与玉文化，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焕发出传世玉器与玉文化的青春。

怎样以考古学方法研究考古学发现的玉器，进而深入这玉器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与文

化呢？近年来，我想来想去，悟来悟去，才认识到任何涉及史的研究无不存在如下三个学术层次，即一是实事，二是求是，三是如太史公讲的“通古今之变”。我在本届年会开幕式上讲了那么一段话，又在这闭幕式上讲了前面说的那些话，目的无非是希望研究玉器与玉文化的朋友能通过玉器与玉文化的“实事”和“求是”的探索，达至那“通古今之变”的学术高峰。这自然是“象牙塔”的研究。没有这“象牙塔”的研究，哪能有玉器与玉文化美轮美奂的学术春天，怎能保持住这学术的春天！那么，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又如何在这“象牙塔”内实现“实事”“求是”和“通古今之变”的探索？下面我就这个问题，和朋友们作点讨论。

1. 就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来讲，所说的“实事”，是要在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一件玉器，和一件玉器或一件玉器中的各个构件的材质、器形、纹饰、工艺及功能等，以及这玉器处在何种关系或什么样的人文环境之中这样一些玉器本体固有的文化与社会属性。玉器中的“一件”玉器，既有一件的一件玉器，也有由多件组合成的一件玉器，例如玉佩便是由多类、多件玉器组合成的一件玉器。当人们审视玉佩时，应把玉佩视为是一件玉器，而不能把玉佩的各类构件，看成是“一件”“一件”的玉器，如果有人如是看待玉佩，那么玉佩就会从他的认识中消失。将玉佩的各类构件视为是“一件”“一件”玉器的认识的考古学者，在其田野中就永远发现不了玉佩。自然，当把玉佩视为“一件”玉器时，也不能忽视对玉佩的各类、各个构件进行仔细认真的考察，同时，也应了解这玉佩是用什么构件组成的，组成为什么样子，怎样组成这个样子，以及为何是这样或那样的造型？其意何在？我想如果对玉佩及其构件应作如是理解的话，那么，其他器物上的玉饰件、玉构件或玉附件也当作这样的理解。

至于说到要搞清楚那玉器处在何种关系或什么样的人文环境之中这一问题，得先了解这“何种关系”，是指“什么关系”？这“什么关系”，一般来说，当包含不同类别玉器之间的关系，玉器与他类器物或遗存之间的关系，和玉器及他类遗存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要求索玉器处在“什么关系”中，就得将玉器放在“具体单位”中进行考察。房屋、作坊、矿井、陶窑、储藏坑、垃圾坑、祭祀坑和墓葬等都属考古学视为的“具体单位”。所以要放在“具体单位”中进行考察，是出于一个颇为具体的追求，即通过“具体单位”中的遗存的共生，去了解其共生的遗存有哪些遗存，不同材质和同一材质的不同类型的遗存在这“具体单位”中的数量及其数量比例关系，以及各类乃至各个遗存在“具体单位”中所处的空间位置及其所体现的关系，并通过这些数据去认识不同材质遗存之间、同一材质的不同类别的遗存之间、不同材质及同一材质不同类别的遗存与人（如果这“具体单位”中含人的话，例如墓葬）之间的关系。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具体单位”中，从至今对这些“单位”所显示的研究的能力与情况，同时就其遗存共生的状态来看，墓葬内的遗存的共生状态，更具典型性。之所以更具典型性，这是因为埋葬死者，乃是生者是以视死如生的观念去送别死者进入虚拟世界继续其现实世界的生活。故葬俗、葬仪、葬制乃至墓葬，基本上便成了生者现实世界生活的投影。所以通过墓葬中的遗存与遗存、遗存与死者的共生关系，便能贴近地探知死者现实世界的生活。当然，通过突变（例如火山爆发、地震、洪水等）掩埋的村落、城市、矿场等场所显示的栩栩如生的图景，来研究古人的生活，虽较通过墓葬所探知的认识更贴近历史的真实，但这类场所的考古学的发现，一是太属偶然，过于稀少，二是显示的往往是先人现实生活的片断，故一般通过墓葬的研究来探索死者现实世界生活，便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基本途径。据此来看，我们欲通过玉器处在何种关系，或什么样的人文环境之中来把握玉器本体固



有的文化与社会属性，就得基本上将玉器置于墓葬这一玉器、他类遗存与人这一共生的“具体单位”中，去求索玉器与他类遗存之间，各类别玉器之间，他类遗存中的各类遗存之间以及不同材质、不同类别的遗存与死者之间的关系，去求索玉器本体固有的文化和社会属性。

2. 就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来说，作了上述“实事”考察之后，就可以对其进行“求是”的探索了。所谓“求是”，是要观察出这玉器与玉文化是否存在着仅是时间的，或仅是空间的，或既是时间又是空间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和据此以观察对象，并做出符合其内在逻辑的释读。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对遗存进行遗存、时、空这三维或遗存、人、时、空这四维关系的观察。这观察的整个过程的关键的关键，是做客观如实的比较。唯其如此，才能对审视对象作出同与异、关联与关系的客观如实的认识，同时，只有在这客观如实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阐释出审视对象所呈现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背后所隐藏的内在逻辑。阐释出这内在逻辑，便达到那“求是”的彼岸了。

要实现此等“求是”的研究，就需要将上述含玉器的“具体单位”置于其共同体，即同一考古学文化墓地内作出共时的同一空间和历时的不同空间的“具体单位”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进行仔细认真的考察，从中识别出这些“具体单位”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所体现出来的一些现象。对这些识别出来的“现象”的认识是否精确到位，取决于对那些“具体单位”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的审视是否精确到位。对那些“具体单位”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的认识是否精确到位，则取决于如下两点：一是对所观察的遗存，或即玉器的形态分类与功能是否已精确到位；二是观察所凭据的人、遗存、时、空或遗存、时、空的框架是否精确到位。一般好的考古报告，应正确地确立好层位学的和类型学的人、遗存、时、空或遗存、时、空这两个时空框架。如果我们的研究遇到的是这样的考古报告，自然应以这报告所确立的时空框架作为基础去进行其后续的研究。但是，现今发表的相当数量的考古报告，都未能达到这一水准。如果我们的研究遇到了这样的考古报告，则需对其发表的资料进行清理和整理，确立正确的层位学和类型学，或层位学、或类型学的时空框架，夯实这一基础，再在这一基础上做出其后续的观察与审视。这样的分析与研究，就是我平常说的：将器物放在“具体单位”，又将这“具体单位”置于“具体遗址（墓地）”中进行分析与研究的途径或方法。把“具体单位”放在“具体遗址（墓地）”进行考察的“求是”，就是将考察“具体遗址（墓地）”所见到的诸“具体单位”之间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体现出来的诸现象的自在逻辑关系变成研究者认识的逻辑。衡量研究者认识的逻辑正误的标准，是看它是否能解释得通诸如“具体单位”之间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体现出来的诸现象所呈现出来的各个矛盾。通俗一点说，这给出来的一个说法，就得释通或摆平这“诸现象”呈现出来的所有问题。至此，这一研究还只能认为是取得了阶段性或局部性的认识成果。

要获得较为“完整的”认识，还需将“具体遗址（墓地）”放在它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已发现的所有遗址（墓地）中进行考察，即放在它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中做一翻认真的审视，以求证、补充、修正乃至完善从“具体遗址（墓地）”的研究中得出的认识。这就是我常说的将“具体遗存（墓地）”放在它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中进行考察。

这一研究的途径与方法，就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从四维或三维去观察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去发现研究对象之间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所体现出来的诸现象的自在逻辑关系，将这客观的自在逻辑关系转化为研究者主观的逻辑认识。这就能实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追求。我写的《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齐家文化的研究》（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所遵循的分析和研究的途径



与方法，便是这里所说的将器物放在单位中，单位放在遗址（墓地）中和遗址（墓地）放在所属考古学文化中进行研究的途径与方法。研究的途径与方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研究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或者应该这样说，我这里说到的这一研究途径与方法，是从我的《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齐家文化的研究》这些研究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我所以讲了这些，还是怕我没能在这里将这一研究的途径与方法说清楚，故将《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齐家文化的研究》等拙作介绍出来，或为了更清楚明白这一研究途径与方法，或为了明白这一研究的途径与方法的实践，请朋友们不妨看看我的这些拙作。认识没有穷期。至此，获得的认识，是否正确，正确的程度怎样，还得受新的考古发现检验。认识的完善是谈不上的，要达到完善的认识是个无穷的过程，因为人们只能走近历史的真实，而不能走到历史的真实。

3. 我们所以要搭建中华玉文化中心这样一个来集合朋友们研究玉器与玉文化的平台，是基于“经济全球化”格局下，试图摸索出“中国文化怎么办”的策略。在我看来，要找到这样的策略，就必须将玉器与玉文化“求是”的研究升华到“通古今之变”的境界。故“通古今之变”，不仅是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准的追求，而且也是实现中华玉文化中心宗旨的要求。可是，我们的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迄今仍基本上停留在“实事”的阶段，做“求是”研究的学者与论著很少。总之，距“通古今之变”的研究意境，还存在着距离。怎么办？欲速则不达！急不得，还得慢慢来。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我理解就是知文化、社会和国家（政权）形态这三者或其中之一，或其中的任何二者的史之兴替的发展或演变的规律。

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欲达到这样境界，或可借鉴我的通过空三足器的演变而得知的考古学文化和考古学文化之文化的演变规律。在21世纪与前一世纪之交的前后三五年，我先后发表了《黄河流域空三足器的兴起》（《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客省庄与三里桥文化的单把鬲及其相关问题》（《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和《杏花文化的侧装双鬲手陶鬲》（《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4期）三篇计约15万字的论著，指出约当泉护二期文化时期，居于颍水上游禹州市的秦王寨文化居民（谷水河遗址三期），吸收了西夏侯期大汶口文化陶鬲这一文化因素，产生了空三足器概念，随后，秦王寨文化居民以这陶鬲的空三足器概念，将传承下来的釜形鼎改造成釜形鬲，导致其考古学文化之文化的大变，秦王寨文化居民便从秦王寨文化发展到了荆村文化（即以往称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荆村文化形成之时，向西越过函谷关和潼关，沿着渭河河谷发展，将约自华县以东的陕、晋、豫交界地带的泉护二期文化居民或其后裔挤到渭河河谷的南北两厢，荆村文化进至武功浒西庄遗址H33时期之后，便以釜形鬲之空三足的概念将传承下来的联体的单把罐形釜灶（案板遗址H20:43）改造成为灵台桥村H4:91和H4:32那样的宽弧形裆单把鬲，造成考古学文化之文化之大变。至此，约自华县以西的荆村文化居民，进入了客省庄文化的发展阶段。此后，居住在晋中地区的泉护二期文化这一文化谱系的一支系的居民，发展到太谷白燕遗址F2及F4时期，吸收了荆村文化釜形鬲的空三足器概念，将其传承下来的与灶配套的折沿陶釜，改造成与荆村文化的文化谱系相区别、形态又不同的折沿釜形鬲。随后，白燕遗址以F2及F4遗存为代表的文化居民又以这折沿釜形鬲的空三足的概念，改造了传承下来的双鬲手连体釜灶，使之成为侧装双鬲手宽弧形裆陶鬲（杏花村遗址H118:7）。同时，又创制了单把宽弧形陶鬲（杏花村遗址H118:10）。随之，呈现出考古学文化之文化大变，使之走出了传统，步入了杏花文化之发展旅程。这股空三足器革命浪潮继续向前推进！当杏花文化走

到了它的宽平裆鬲阶段，我们看到约自洛阳盆地以西的陕、晋、豫邻近地区形成了以陶鬲和侧装双釜宽弧裆陶鬲为核心的陶器组合的东关文化。东关文化吸收了客省庄文化的单把尖角裆陶鬲，转变为三里桥文化。东关文化的陶鬲形态多样，IH198:11 这样形式的陶鬲是这一文化的主流形态。这类陶鬲的形态和荆村文化的主流形态的陶鬲不同，当不是传承荆村文化陶鬲演变的产物，从它的上部的陶釜来看，颇像泉护二期文化的陶釜。泉护二期文化的陶釜，当是它的祖源。故可认为是泉护二期文化的后裔，受到了荆村文化陶鬲概念的启发，将陶釜改造成陶鬲，制成了形态和荆村文化不同的另一文化谱系的陶鬲。接着，掌握这一陶鬲的考古学文化居民，又模仿陶鬲将具有自己特色的联体釜灶革新为侧装双釜手宽弧裆陶鬲，这样，便将自己的考古学文化推进到了东关文化发展阶段。

这就是我通过以空三足器演变为主导，观察到的黄河流域史前不同文化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和同一考古学文化中的不同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文化因素的碰撞、吸收与融合，实现考古学文化的文化与考古学文化推陈出新的波浪汹涌的旅程，我称之为黄河流域空三足器革命！同时，我从这一革命中看到文化的传承、吸收、融合与创新，乃是推进这一文化革命的演进规律。玉器与玉文化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研究？玉文化的演进是否存在着规律，如果有规律，那规律是什么，我发现这一考古学文化的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演进规律之后，粗略地审视了某些其他文化，发现这考古学文化演进规律具有相当普遍的适应性。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中国或中华文化怎么办？我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遵循“传承、吸收、融合、创新”这一文化的演进规律，以之作为战略，走文化杂交的路，这样便能实现全球文化的“美美与共，不同而和”。如是看来，释读出考古学文化之文化与考古学文化之演进规律，便可将考古学文化之文化的研究推至太史公说的“通古今之变”的境界。这样说，已自感相当狂妄了！但扪心自问，我到了这样的年龄，实不需自吹自擂，所以说了这些，目的只有一个，仅是为了推进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其他就管不了！玉器与玉文化研究闯进“通古今之变”，是我唯一的、赤诚的、热切的希望。

（据黄莉记录整理的讲话稿，于2016年8月18日改成此文）



# 九连墩玉器初探

胡雅丽<sup>1</sup> 翁 蓓<sup>2</sup>

九连墩玉器出土于2002年，见于2002年9月至12月间发掘的枣阳九连墩1、2号楚墓之中<sup>(1)</sup>。

研究表明，九连墩1、2号楚墓的下葬年代，约略在战国中晚期稍后，墓主等级属大夫之列<sup>(2)</sup>。1号墓主为男性，2号墓主为女性，两墓墓主关系是夫妻<sup>(3)</sup>。如此，九连墩1、2号墓出土玉器，即为战国中晚期时代，楚国某个中等贵族家庭所拥有。对其最基本的原生信息做一些梳理记录，或许是我们得以窥探那个时代于万一的契机。基于此，本文拟从一个考古报告整理者的视觉，就九连墩出土玉器的质地色泽、形制结构、纹饰组合、制作技法等诸多观察所得，向大家作一个粗浅的介绍，并敬乞各位批评指教，以使《九连墩楚墓》考古报告的编写，不断趋向还原遗物初始状貌的理想。

## 一、九连墩玉器的质地色泽

古人关于玉的明确定义，有文字记载可考者，最早见于汉代字书。《说文解字》谓：“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尊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一言以蔽之，美丽且内涵合于德行的石头即为玉。其后，众说纷纭，莫不出其右者。可见，汉代以前的古人，对于玉的认知，有着与今人不一样的着眼点。因此，归纳并陈述九连墩玉器，自当尽可能遵循墓主人时代的思维。这样，九连墩1、2号墓出土玉器的质料，不仅包含了目下所谓之软玉，还包含了玛瑙、半玉，以及石。以此计算，则两墓出土各类玉器，共计104件套，单个计数532件。

九连墩1号墓出土玉器75件套，单个计数295件，分别由石、半玉、软玉三种质材雕琢而成。所谓半玉，即经书所云之“石似玉”“美石似玉”“石而次玉”者<sup>(4)</sup>。

石质器物11件套，单个计数44件。

其中1件套扣器，单个计数34件，30件为青白色石料制成，4件为青白色玉料制成，石料质较疏，玉料质亦较疏，或为缀联加固车马器漆皮件的专门器件<sup>(5)</sup>。

另外10件套，单个计数10件，计有素面圭2件，素面璧1件，素面环3件，谷纹环2件，素面鞞1件，龙首带钩1件。其中2件谷纹环，1件为棕褐色，1件为褐黄色，石质结构都比较紧密细致，制作都较精良；鞞和龙首带钩，皆呈褐黄色，石质稍疏，制作一般，都出自西室，见于容饰物品收纳箱中，是墓主生前实用，死后欲至另一世界继续使用的佩挂。另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 湖北省博物馆

外几件素面的圭、璧、环，石质疏松，呈米白色，制作简洁，出土时即因其结构松溶而难以取起，除1件环被置于内棺盖面东端外，余皆同另几件玉质环璧一起，均匀散布于外棺内底板之上，当是下葬时祷祠天地神祇，安置墓主灵魂的祭献品<sup>(6)</sup>。

半玉质器物1件套，单个计数1件，灰白色，质地细腻，器表光润，制作精良，强光下不透。整器呈椭圆形环状，两面雕琢谷纹，用为青铜削刀的刀首。该削刀由铜身、金扣、半玉首组合而成，做工十分精美细致，是所有削刀中唯一以玉石装饰者。

这些石质、半石质器物，既有车马用器附件，也有墓主生前佩挂，还有随身用物饰件，更有遣葬时祀神安祖的祭器。至少可以说明，材质的优劣，与功用的轻重，似乎并非必然挂钩，只要材质足够美丽合意，就会受到青睐。然则，汉人关于玉即美石，配德就好的定义，确实合乎战国时人的认知，所云必定其来有自，文献记载并非虚言。

玉质器物63件套，单个计数250件。其中：

白玉质器物7件套，单个计数13件；

青白玉质器物26件套，单个计数30件；

青黄玉质器物11件套，单个计数14件；

青玉质器物5件套，单个计数6件；

碧玉质器物10件套，单个计数15件；

褐黄玉质器物3件套，单个计数3件；

米黄和青灰玉质器物1件套，单个计数169件。

可以看出，此墓使用青玉系列材质制成的器物最多，累计达42件套，占到玉质器物的三分之二强，这还并未将米黄和青灰玉材质制成的1件套玉珠串（单个计数169件）计算在内。使用碧玉材质、白玉材质、褐黄玉材质制成的玉器，虽然分别占到玉质器物总数的第二、第三、第四，但三者相加，也只勉强接近玉质器物的三分之一。

在所有玉质器物中，白玉结构致密，细腻润泽，晶莹柔和，表溢脂光，质地最好，其中1件套、单个计数2件的同工同璞之白玉——羊脂白玉龙虎相望镂空雕牌，结构紧密，质地细腻，滋润光泽，晶莹剔透，洁白无瑕，脂光油亮，堪称九连墩玉器材质之最，唯琢器者保留了伴生的糖皮，提醒着我们，古时好玉亦难觅。白玉料小量少，主要用来制作小环，其最大的1件，直径5.1厘米、孔径2.6厘米，稍大的1件，直径3.7厘米、孔径2.1厘米，最小的几件，直径仅在1.5~1.6厘米之间，孔径在0.3~0.5厘米之间，后者有可能是利用类似前者制器成型时，挖出的孔芯制作而成，其材料利用率不可谓不高，表明原料之得来不易。

青白玉材质的器物数量较多，其色泽材质的差异也相应较为明显，大致可归纳为三类，每类器物数量基本相当，材质色泽等次则逐类次第有降。

一类白色泛淡青，个别光下可见极淡的浅紫，质地细腻，温润柔和，纯净无杂质，内见飘絮状蕴含，表有油脂光泽，其品色几可与白玉媲美，仅见于用材尺度不大，有长有短的圆形或扁形管器、歧柱形扣器，以及个别牌形器。

二类白色泛青灰，质地比较细腻，滋润感较强，内散见细小墨点，有油脂或蜡状光泽。

三类白色泛青绿，质地较疏松，有一定滋润感，内布墨点稍大稍密，有的墨点集合呈粗线或条带状，有蜡状光泽。

二、三类材质制作的器物，种类较广泛，主要有珩、环、瑗、牌，以及鞞。

青黄玉质器物约当青白玉质器物的一半，除了色泽有所不同外，其质地基本与青白玉中的二类材质相当，器物类型亦较广泛，有珩、管、环、鞞、带钩、牌。